

莫做“公堂木偶”

“中国式过马路” 折射什么心态

4岁孩子要学会体谅父母辛劳?是这样的。15日,教育部网站公布了《3岁-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给学前孩子的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个领域的成长设定了一个“阶梯”状的标准。(10月16日《京华时报》)

设定儿童成长阶梯标准 是一根筋思维

在网上挂着的这部《指南》开宗明义,要指导公众转变教育观念,防止和克服“小学化”倾向。但以设定的标准而言,一些标准横着看都比对小学生的要求还要高。

无论是家长教育孩子,还是孩子的社会化过程,都需要施之以好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说,孩子是随着社会成长,而家长也要随着孩子成长。培养孩子不是一件易事,在父母和孩子的相互作用中,作为动物的人一步步成为一个社会的人,并形成各种个性、各种品格。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无疑,家庭是最重要的首属群体,孩子只有在首属群体中自我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在家庭中,孩子通过与父母的相互关系形成一种自我感。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逐渐懂得了:什么是父母所期待他们的,父母怎样评价他们的行为,父母对他们的感觉。了解了这些后,孩子们就力图成为父母所期望的他们的自我。

社会学家波普诺认为,从生物学上来说,人必须度过6年的幼儿期,就是说,完全依赖时期,他们在全部生活中有15%~25%的时间都依赖父母。另一位社会学家皮亚吉则特别认为,孩子的学习是一个能动过程,那种“任何孩子能在任何时候学习任何东西”的说法是错误的和荒谬的。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2到3岁是“操作前阶段”,在此期间,孩子学习使用和弄懂符号。他们学习说话和开始描画物体。到了这个阶段后期,孩子们就可以清楚地说出词与词之间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差别。

在《指南》的关心尊重他人章节中,要求4岁~5岁知道父母的职业,能体会到父母为养育自己所付出的辛劳。这看似既为家长好,也为孩子好,但这显然是太为难为两者了。从根本上讲,任何孩子并不能在任何时候学习并体验任何东西,体会父母的养育之恩,是一个人终生都要学习的伦理课程,但在4岁~5岁这一幼儿阶段,疑似不可能。“谁知盘中餐,爹妈最辛苦”,聪明的孩子或许会跟着别人学说这样的话,可硬要他体会他力所不逮的东西,是不是在拔苗助长?

制作《指南》,这是给孩子看的,还是给家长看的?制定出标准,这是给孩子定的,还是给家长定的?如果孩子不看,家长也不看,这样的《指南》还怎么指北指南,这样的标准又有什么用?可以说,孩子的成长有其一定的规律性,莫名其妙的“要多喝白开水”之类的标准看起来挺好,但却不顶用。

《指南》式的思维,可称之为“一根筋”式的。这既给自己出了难题,也给家长孩子出了难题。制作者大概不明白,指北指南越具体,越是易陷入空想和搞笑的小小怪圈。今语

10月8日,北京地铁内,一位老人与一个年轻人争吵,老人当场猝死,原因之一是人太挤;10月6日,武汉机场,三名旅客因为取行李发生碰撞大打出手……

汽车未到站就拥成一团,飞机没停稳就打开手机,意见稍有不合就拳脚相加,中国人,你急什么?(10月14日《半岛都市报》)

中国人急从何来

急生乱,乱生烦。因为一点小事,男士没了风度,女士不顾形象,年纪大的失去了宽容,年龄小的忘记了尊重,动不动就在公共场合上演这样的对骂、血战,亲们,咱这是怎么了?

有人说了,不急不行,不抢吃亏啊。公交车来了,晚半步上车就得站着;商场传出商品打折促销的消息,一大早早就挤满了人,营业时间一到,人潮蜂拥而入,瞬间就将诸般“实惠”一扫而空;为了孩子能上一个条件好的幼儿园,天刚亮就起床去报名。不急,没便宜占,不抢,没你份儿,不少人正是抱着这样的心理,才会事事急,时时急,你挤我抢乱作一团。

可以理解国人的这种心态,谁让我们生活在一个人多资源少的社会呢,有些情况下不急不抢还真是不行。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么急。拿乘火车来说,上车后都是对号入座,不管上车早晚,没人会占了属于你的位子。然而往往是尚未开始检票,一围人就摩拳擦掌挤在检票口,等到通往站台的门一打开,那场面就更壮观了,拖着箱子的、扛着行李的、抱着孩子的,个个都一路小跑,奋勇向前,一副跑慢了火车就开走了的架势。

急什么急?挤什么挤!看着别人急不可耐,乱作一团的样子,不少人会有这种置身事外的理智。可一旦自己身临其境,急躁又会不由自主生出,很自然地加入挤的大军。没办法,大环境使然,很难做到“不慌不忙”。

所以,要改变中国人这种着急的性格,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明白一点,国人之所以变得这么急,与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物质匮乏、供求严重失衡有很大关系。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人们赶早不赶晚,跑快不跑慢,凡事都表现出急匆匆的样子。就是现在,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依然存在资源不足、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在这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前,国人着急的毛病短期内难以改掉。

另外,公民自身素质也有待提高,就像前面上面所说的,有些情况下完全没必要那么急躁。公交车上互相谦让一些,莫失文明;开车慢一点,注意安全;按规矩排队不加塞儿,讲点礼貌。咱该急的急,不需要急的时候就别那么急躁了。于静

家长的教育焦虑从何而来?

林艾女士自称用了6年时间力图把孩子培养成一个自尊自信、懂得尊重他人且有创造性的人。但是孩子的小学生活才开始一个月,他的培养理念便受到了来自学校教育的基本挑战。这使她不禁担心,把孩子交给学校,6年之后她将收获怎样一个孩子?(10月10日《中国青年报》)

林艾女士的焦虑代表了一些人对教育现状的担忧,中国的教育方式久已被诟病为“抹杀个性,扼杀创造力”,当前教育的某些乱象更让人痛心疾首。但现行的学校教育真的与现代教育理念格格不入吗?我看并不尽然。学校统一的要求并非是对孩子个性的压制,而是一个集体应有的纪律规范;适当的学习负担可以帮助孩子更快完成知识积累,绝非是缺乏耐心的揠苗助长;老师因故没能回复家长的短信,更不能当成是不尊重的证据。初为学生的家长焦虑可以理解,但以此说明当前的学校教育颠覆了现代教育理念未免过于苛责。

现代教育理念的内涵无外乎提倡以人为本、素质为先,创造性、主体性、个性化和全面发展。可以肯定的

现实中,如何对待工作岗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基层宣传干部周恩义看来,一个党员、干部对职务应该淡定,对名利应该淡漠,但对事业要充满激情、保持干劲,时时用“无功就是过,庸碌就是错”来鞭策自己。

正是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周恩义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扑在事业上,一门心思要把工作做好。身体伤残击不倒他,家庭负担拖不垮他,名利诱惑绊不住他,任务繁重难不倒他,周恩义每走一步都留下了一颗共产党员的闪光点。正是把有些人看轻的基层宣传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

岗位可以平凡,但业绩不能平庸,像周恩义这样的党员干部不在少数。但也有一些人奉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生哲学,他们无心干事、无力作为,工作四平八稳、看摊守业,满足于应付了事、过得去,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惯于当“太平官”、“清闲官”。这不仅自损形象,而且误事殃民。

清代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讲了这样一则寓言故事。

一个官员在阎王面前自称生时为官清廉,所到之处,只饮一杯清水,可以无愧于鬼神。阎王笑道:设官是为了兴利除弊,如果不贪钱就是好官,那么在公堂中设一木偶,连水都不用喝,岂不更胜于你?官员不服,辩解道:我虽无功,但总无过。阎王怒道:你处处只求保全自己,该办的事不办,该断的案不断,岂不是负国负民,无功就是过啊。

这则寓言很值得我们深思。在其位谋其政,有位当有为,这是基本的政治伦理。对照现实,一些干部出勤不出力、出力不出绩、谋人不谋事,遇到矛盾绕着走,见了困难就低头,什么事也干不成,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像木偶一样成了机关里的“摆设”。这样貌似好人的不作为干部,表面看风险不沾边、问题不沾身,看似“成熟”,实则庸碌无为、失职失责,非但群众不认可,事业发展更难以容许。

从这个意义上说,占着位置不干事,拿着俸禄混日子,就是为官者的失职。这不仅是事业观和价值观的问题,也是职业操守问题。细探究竟,或因怕多干事会

出差错、添乱子,甚至掉帽子、丢位置,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缺乏干事创业的担当与勇气;或因进取精神不足,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总把眼前的利看得太重,把长远发展看得太轻,小进则满、小富即安,缺乏赶超跨越、追求卓越的劲头与朝气。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期,发展正处在攻坚期,许多新旧难题躲不开、绕不过、推不掉。与改革的破冰期相比,今天我们面对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更加需要“冒”的精神、“闯”的劲头,需要一大批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善于开拓的党员干部,不断攻坚克难,在实干中创造业绩,在实效中体现价值。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为政者而言,心态决定状态,状态决定业绩。把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清醒忧患的危机感和执政为民的责任感注入心中,才能远离“公堂木偶”的工作状态,珍惜岗位、奋发有为,真正把心思用在谋发展、干实事上,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李伟峰

食品安全岂是“考”出来的

近日,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区董事长赵惠敏等多位知名企业家,参加了杭州质监局组织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考试。这一考试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已举办了40余场,有近400家企业的1100多位企业法人代表、生产主管和质检人员参加。用食品安全法律考试提高从业者素质,杭州质监部门的初衷并不坏,然而,此举却有违法之嫌。据悉,如果企业法人代表和相关负责人两次未通过考试,企业就将被暂停核发生产许可证,企业必须停产停工。这无疑是一种行政许可设定,而根据《行政许可法》规定,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才能设定行政许可,杭州质监部门肯定没这个权限。在不乐观的食品安全形势下,政府认为需要通过一些行政许可,对食品从业人员资质提出要求,不是不可以,但须依法而行。蒋跃新



“80后贪腐新兵” 引出官德新命题

从科员到“副局长”,升迁时间不到两年,头顶多个“杰出青年”的耀眼光环,年仅32岁的肖明辉,在5亿元的工程招标中收受1611万元的“好处费”。日前,肖明辉被海南省中院依法判无期徒刑。

在公众看来,越是年轻干部,越应该廉洁自律,因为他们要有过硬的专业素质,要有上级领导赏识,一旦步入仕途,很快便能得到提拔重用。回顾肖明辉的成长历程,不能不让人艳羡:2006年清华大学硕士毕业,被海南省作为人才引进,进入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担任建设工程管理主管。随后迅速受到重用,先后完成了洋浦众多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出色完成了多项重大项目的筹备工作,不到两年就成为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副局长。在这期间,又荣获海南省第九届十大“杰出青年”荣誉称号,并授予“海南青年五四奖章”。真可谓前途不可限量的年轻才俊。

而随着他们走上更高的领导岗位,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受到的诱惑越来越多,风险也就随之加大。事实也不出所料,洋浦保税港区建设安置房及配套公共服务设施项目的重担落到了肖明辉肩上。然而,正是这个5亿元的安置房项目,使他走向了腐败堕落的深渊。而堕落的起因和其他贪官并没有什么区别,那就是从工程招标中利用手中的权力收取“好处费”。

80后副局长的落马,首先,再一次验证了权力得不到监督的可怕:一个5亿元的工程合同,只要副局长“暗箱操作”一下,就可以如愿让出“好处费”的公司中标;同时也证明了在工程招标中,“潜规则”无处不在:5个亿的工程,仅有5%的“好处费”,副局长受贿“心安理得”,中标单位行贿“合情合理”。所谓的招标投标程序,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让这一钱权交易看起来显得更加“顺理成章”。

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会导致腐败,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其次,从80后副局长的腐败之路也可以看出,贪腐没有年龄之分。但随着越来越多年轻干部的落马,多少表明我们对年轻官员责任意识教育还相当缺乏,特别是这一社会精英阶层,如何在他们在权力的岗位上有所敬畏、增加风险意识,必须及时补上这一课。

这时不但需要法律制度的约束,同时对这些年轻干部的个人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律制度的严格执行是监督官员的利器,但年轻官员大权在握后,很容易被“糖衣炮弹”擗倒,似乎在提醒我们:年轻官员的快速成长是好事,但鉴于他们学习能力较强,更易被外在东西诱惑,因而,对他们的道德要求不能滞后于其受重用的速度。

尽管我们现在有官德的制度化要求,但这些都是对身为官员的内在道德约束。我们在强调官德之时,很多时候忽视了做人道德、社会公德的教育,而这些往往是贯穿于平时的社会化教育之中。回顾年轻官员等社会精英的腐败堕落轨迹,他们的价值观很值得拷问。而他们价值观的错位,又往往在学生时代的应试教育模式中便已埋下伏笔。

矫正他们扭曲的价值观,除了对权力进行制约,从学生时代就让“未来官员”们学会做人,同样不可或缺。李龙

的众生沉默,反差强烈。手机的便利压缩了时空,虚拟空间里的狂欢回归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回归现实却是人的精神和情感变得更加空虚和苍白。小说《手机》被冯小刚拍成电影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电影的主角严守一就是在手机给他的生活带来快乐、带来爱情的同时,也使他婚姻遇到了很大的危机,而危机的爆发是因为他偶然把手机落在了家里。

这俨然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手机引发的爱情、友情、亲情等伦理悲剧多如牛毛,可能谁都有过因为玩手机将别人或被别人晾在一边的经历。亦如刘震云所说:“《手机》反映出了人与人关系的改变,包括心与心之间的扭曲。”沉溺于手机的奇幻世界,淡漠了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无疑会消解信任,增加隔阂,终造成一种疏远,亲密的关系因此而生硬。

老人摔盘离席的现实案例警示我们,手机虽是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若不加节制,找回人们对自身的控制力,必然会给生活带来麻烦,致使人际关系退化,甚至引发社会伦理危机。侯金亮

警惕手机依赖引发社会伦理危机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却在玩手机。”近日,张先生与弟妹妹相约去爷爷家吃晚饭,饭桌上老人多次想和孙子孙女说话,但面前的孩子们却个个抱着手机玩,老人受到冷落,一怒之下摔了盘子离席。(10月15日《城市信报》)

很多人都有“手机铃声响了”的幻觉,边走边玩手机的人是大街上躲不过的风景,公交车、地铁、会场、课堂、办公室……只要你想要的地方,几乎都有人在玩手机。倘若在一个地方,手机没信号或上不了网,很多人会异常的焦虑和焦躁,好像被这个世界无情地抛弃了一样。

有网友称:“朋友们一起走路时我会提醒他们,帮我看着路。我朋友有时候都看不下去了,会朝我喊能不能收起手机说会儿话。”对手机的依赖使我们忽略了与自己的亲人、朋友、同事的交流,都在玩手机,谁也不理谁的现象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手机里的众声喧哗与手机外

“被幸福”的莫言正被“过度消费”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接受央视采访,在被记者追问“你幸福吗”时,莫言干脆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10月15日中国新闻网)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接受央视采访,在被记者追问“你幸福吗”时,莫言干脆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10月15日中国新闻网)

一票真金白银再说;譬如某些政绩部门,打造故居圣地、创意展览经济,发掘这棵“摇钱树”的最大商业价值,再来一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譬如投机商人,哪怕一幅字画,只言片语,炒作点话题再说,眼球就是效益,反正攀附“无下限”……扑面而来的“传奇”,与文学无关、与莫言无关,与诺奖无关,不过在过度消费一个“热点人物”的商业价值。

诺奖不是一切,莫言的诺奖也不会真正与天下万物“与有荣焉”。中国文学正在路上,那些早已“走散”的文学男女青年,也断不会因一个诺奖而以粉丝的身份再度皈依,甚至那些缺钙的创意能力与科技短板,也绝不会因为一个文学诺奖就缩短了比肩大师的距离。没事儿少打扰人家的“幸福”,或者至少读几页莫言的书,再来“围观”或“加油”好吗? 邓海建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接受央视采访,在被记者追问“你幸福吗”时,莫言干脆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10月15日中国新闻网)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接受央视采访,在被记者追问“你幸福吗”时,莫言干脆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10月15日中国新闻网)